

冷战后时期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倪世雄

在1993年11月19-20日的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次会晤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使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

人们都关心: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现状如何?西雅图会晤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简短的历史回顾

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演变经历了一个充满曲折和反复的过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1. 对抗阶段(1949-1971)。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苏美形成对抗,中国“一边倒”,中美互为敌人,两国长期处于敌视状态。60年代末,随着中苏分裂、美苏缓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大使级谈判取得进展,“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敲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2. 正常化阶段(1972-1978)。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不正常的敌视状态的结束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在这一阶段,双方互设联络处,开始了政

府官员的互访、学术文化科技交流,经贸关系也进入了启动状态,两国间贸易总额从70年代初的9.5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50亿美元。

3. 发展阶段(1979-1989)。这10年是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10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学术文化科技交流增加,访美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达到7、8万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两国经贸联系更为密切,两国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50亿美元跃升至80年代末的194亿美元,中国成了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国,是在亚洲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在华投资达1300多项,协议资金总额为43亿美元。此外,两国还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这一时期,两国关系中也出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胡娜事件等问题,但主流是发展的、向上的。这1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不可低估,它为中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中美关系能经受“六·四”事件这样巨大的冲击而不致于破裂,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4. 困难阶段(1989-1992)。“六·四”事件后,美国打着“关心中国的民主运动”和“尊重国际人权”的旗号,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并对中国进行种种经济制裁,使中美关系一下子从发展的“高峰”跌入“低谷”,两国业已形成的友好合作关系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一阶段又经历了损害和修复的过程。“六·四”事件后的一年里,“脆弱的”中美关系受到了

严重的损害^①，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人权、经贸、军售等）出现严重的分歧。但幸运的是，双方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仍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正如前驻华大使恒安石所说，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然而，尼克松和毛泽东为双方关系奠定的基础还在。以后，两国关系处于缓慢修复过程中，困难犹存。

5. 调整阶段（1992年至今）。克林顿大选获胜，成为冷战后第一位美国总统。美国总统职位从共和党到民主党、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的这一重大交替，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1992年11月美国大选后不久，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作讲话时，认为中美关系的这一阶段为“调整阶段”，西雅图会晤则表明调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推动。

中美关系的新特点

经历了20年发展的中美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开始呈现出一些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不同的新特点。

首先，由于东西方全球对抗和苏联直接威胁的消失，对美国来说，中国原有的战略地位有了变化，中国原先是大三角的重要一角，对美国遏制苏联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大三角的消失，中美关系原有的这一战略合作基础开始动摇。过去，出于安全利益的考虑，美国在不少问题上被迫对中国让步，以换取中国对其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这一必要性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消失而大大地削弱了。自然地，中美双方过去被这一战略合作掩盖着的分歧和矛盾冲突也就突出出来。这是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其次，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强调超级大国全球争夺的背

景，而更注意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中美关系中的“亚太因素”将大于“全球因素”，美中日在亚太地区的三角关系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中美双方将更多地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外部的全球变数作出的两国关系的决策。

再次，苏联解体后，客观上美国和中国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上的新对立。针对中国的“民主宣传”与“和平渗透”正是这一新冲突的反映。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的影响与反影响，演变和反演变将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后，“六·四”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党一致立场趋于瓦解，布什政府在强调中美双边战略关系的同时，却忽视了国内政策的协调，结果以激化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为代价，才得以勉强维持住目前的中美关系。冷战的结束为美国解决国内问题提供了良机，特别是1992年大选的结果造就了“民主党总统一—民主党控制国会”的局面，为恢复两党对华政策的一致立场展现了某种可能。因此，不少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提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应实现两方面目标——协调国内政治，重建两党一致立场；逐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三大分歧（人权、经贸、军售问题），恢复和发展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一双重目标“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国内经济问题，因此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美国经济实力上。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提出了对外战略“三支柱”（经济、民主和安全）和对外政策“六重点”：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世界贸易谈判、中东和平计划、美俄关系与对俄援助、南斯拉夫

内战、索马里事件。中美关系未列为重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中美关系不重要，而是在克林顿政府看来暂时还不把对华关系看得那么紧迫和严重。这是考察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点。

当时，有四个因素影响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一是竞选时的“表态”。克林顿为了赢得大选，竭力抨击布什的对外政策，包括其对外政策。克林顿认为，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后对中国“太手软”，采取了退让政策和容忍态度，甚至还派遣特使到中国秘密访问以求友善。克林顿还批评布什无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的决定，他说，他要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与严格的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如果中国想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中国就必须尊重人权、开放市场、停止出售导弹和转让核技术”。二是布什政策的“继承”。克林顿曾多次表示，他将继承布什的对外政策。布什后期的对华政策已趋于强硬，如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这一转变便于克林顿衔接其对外政策。三是民主党的“传统”。克林顿政府的外交班子多为原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将会呈现鲜明的民主党外交传统，如强调对外政策中的人权和民主因素。四是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国决不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在战略上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地，中美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显示出新的重要性。难怪乎克林顿指出，中国的地位仍很重要，“这个伟大国家所走的道路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影响。我们无意看到中国分裂或濒临内乱，我们应用我们的关系影响中国，使之实现向民主目标的和平过渡，并让自由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克林顿还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很重要，不应该孤立中国。”^⑨现在看来，克林顿政府在“表态”、“继承”、“传统”、“现实”四个因素之间求得一个平衡点，然后，支架

在这一平衡点上着手调整其对外政策。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政界、政策层和学术圈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强硬派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为了联华制苏而迁就中国，如今冷战已成为过去，中国已丧失了战略价值，不应再迁就中国，而应正视这一潜在对手，主张克林顿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温和派认为，说冷战后中国战略意义下降是错误的，主张用“智慧和克制”避免关系的新冲突和新危机，提出以软条件处理最惠国待遇，同时希望中国给予配合，积极协作，以解决两国之间的争议和难题。中间派则认为，冷战后，美日欧形成的经济战略三角取代了过去的美苏中政治战略三角。从长远看，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从短期看，双边关系仍有不少变数和困难，因此，对中国应取软硬两手，既正视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对此有所防范，又要在具体的双边问题上寻找共同的解决途径。三派的观点和立场无疑将影响克林顿政策的调整趋向，调整后的对华政策将很有可能是包含各派部分主张的混合体。

关于中美关系的今后走向，目前仍显现多种可能性：恶化？改善？妥协？合作？友好？还有待于时日的考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据此提出，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冲突与合作相结合”的政策。^⑩一方面，在利益冲突领域，利用优势，施加压力，逼中国让步，但不会孤立中国或贸然采取极端的导致关系恶化作法；另一方面，在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或中国愿意妥协的问题上，尽量保持联系，进行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合作。

中美关系调整的关键及其问题

调整离不开国际大背景的变化。我认

为，中美关系在现阶段调整的关键是：

首先，应从冷战后国际关系变化的全局把握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其关键在于从原有旧的战略合作基础调整到新的战略合作基础。

中国并没有因为苏联威胁的消失而在战略上变得无足轻重，相反，中美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显示出新的重要性。从全球看，在防止核扩散、实现裁军和军备控制，在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以及解决诸如人口、环境和难民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从双边关系看，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市场和投资场所。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最近说，克林顿政府“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价值，对于美国商人来说，中国市场具有“惊人的机会”。^④中美经贸往来潜力很大，亚太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克林顿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地区。

其次，双方应积极谨慎地对待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即人权、经贸和军售。

——人权问题。“六·四事件”后，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存在的最大障碍。其症结在于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企图以美国的价值和意志强加于人，以致中美双方一度处于“人权对抗”的状况。美国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指出，人权问题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难以妥协和调和”。尽管这几年在人权问题上有所改善，但分歧仍在，目前主要集中在政治犯、新闻与言论自由和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以人权为借口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克林顿政府则坚持称，人权问题是建立正常、全面和建设性关系的障碍。

——经贸问题。这包括贸易赤字、劳

改产品、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问题。目前，贸易赤字仍很突出。根据美方统计，1982年，美国顺差4.1亿美元，1990年美国就已逆差104亿美元，1992年达18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对日本的逆差。^⑤

——军售问题。美国指责中国自1989年以来增加了54%的军费，从俄罗斯进口苏-27战斗机、空中加油技术设备和地对空导弹设备。更有甚者，美国根据对所谓的大量情报的分析，断定中国已向巴基斯坦转让了M-11导弹技术，并以此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于1993年8月27日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指出，中国没有做过违反“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承诺的事。这场“导弹风波”尚未过去。它表明，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因素有上升趋势，已引起了两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有上述3大障碍，而且还在于美国在“六·四事件”后利用每年一次的审议，坚持把这些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在一起。“六·四”后，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利用每年一次的审议，企图把中美经济关系政治化，以达到压服中国的目的，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的坚决反对。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最惠国待遇问题又一次提到美国政府的面前，有条件还是无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起初使克林顿政府陷入了新的困境。但困境还不是绝路，出路是仍然存在的。克林顿政府绞尽脑汁，最终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于1993年5月28日发布行政命令，决定在1993-1994年度不提条件，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1995年度的最惠国待遇的延长将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经贸、军售将作为独立的问题加以审议，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美国著名学者哈里·哈丁博士称这是克林顿政府在24小时内做出的明智决定，含有美国国内赞成派和反对派都愿意听的话，都愿意看到

的内容。^⑥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到今年5月底，围绕1994-1995年度最惠国待遇的延长会不会风波再起。中国政府反对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等问题联系起来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钱其琛外长最近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接受把与贸易无关的一些问题作为条件附加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因为这样做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种做法，即施加压力的做法。中国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提出：对中国采取消极的政策是错误的，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应附加条件。我认为，目前对美方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调整”重于“联系”，克林顿政府应把美中关系从过去共同反对苏联威胁的旧战略基础调整到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新战略基础，特别是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基础，只有以调整的战略思路来处理最惠国待遇才能找到出路，而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解决又会进一步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第三，恢复两国官方的全面的接触，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妥善地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

1993年7月和8月，钱其琛外长与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新加坡和纽约两次会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0月上旬，美国负责人权问题的副国务卿谢塔克访华，他访问北京和西藏之后，获得了良好印象。10月中旬，美国农业部长埃斯波作为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位内阁成员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说，他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鉴于克林顿政府决心改善中美关系，他相信会有更多的美国高级官员到中国访问。紧接着，10月底和11月初，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里曼访问北京，受到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接见，并与国防部长迟浩田就武器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正式恢复了中美两国的军事接触。

所有这些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1989年以来冷淡疏远的中美关系的基本结束，同时为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克林顿的西雅图正式会晤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江泽民-克林顿的西雅图正式会晤，把中美关系的调整推向一个新高度，其积极的势头将会持续下去。中美双方都应珍惜这一历史机遇，为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构筑新的坚实基础。

中美关系的前景

对此，我抱谨慎的乐观态度。

由于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中美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可能很突出，很尖锐。今后，中美之间在人权、经贸、军售和武器扩散等问题上还会出现新的摩擦和矛盾，围绕1994-1995年度最惠国待遇问题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尽管西雅图会晤对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如果认为，只要中美首脑会晤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就未免太简单幼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种“冲突与合作”、“困难与希望”共存的关系。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指出：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客观现实仍需要中美之间加强和扩大互利合作。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这就要求两国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一要有长远的眼光，需要看到，两国不论在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都有着广泛和长远的共同利益；二是要妥善处理分歧，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要让分歧来妨碍和损害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克林顿也表示，“希望能同中国保持最大限度的良好关系”^⑦，“美国不能孤立中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全

面关系”。^④克里斯托弗则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设法与中国发展一种稳固的关系”，即“一种在广泛战略范围内允许解决各种分歧的全面关系”。人们高兴地看到，双方上述的表态在西雅图会晤时取得了共识。为了使中美关系尽早走出困境，中国领导人在1993年下半年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西雅图会晤之前，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态度是“认真、积极、向前看”。概括起来，中国的态度和方针主要有以下几点：

——中美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要有长远眼光，要着眼于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点，在发展经贸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等领域存在许多的共同利益。而中美关系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中美应在此基础上增加信任，发展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至于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和障碍，双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内政的作法。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坚持平等互利，就可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希望据此原则妥善解决1994-1995年最惠国待遇问题。

冷战后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动时期。我不禁想起了邓小平先生在几年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时讲的一段至今读来仍震撼人心的话语：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

系是要好起来才行……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请特使转靠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⑤

人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在中美关系的三个公报的基础上，抓住西雅图会议的有利时机，逐步消除障碍，克服困难，使中美关系得到真正的改善和发展。

(1993年12月完稿)

注释：

①哈里·哈丁：《脆弱的关系：1972年以来的美国和中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1992年版。

②克林顿1992年10月1日在威斯康星州发表的演讲和1992年10月11日在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的答辨。

③罗伯特·罗斯：《美国对华政策》，见罗伯特·埃利和塞耶姆·布朗编《美国对外政策：寻求新的作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3年英文版。

④克里斯托弗1993年10月20日在美国国务院向400多名美国企业界领导人发表的讲话。

⑤见美国大西洋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报告：《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与中国》，1993年2月。

⑥哈里·哈丁1993年8月2日在中国山东烟台《国际问题务虚会》上的讲话。

⑦克林顿1993年5月3日在华盛顿会见香港总督彭定康时的谈话。

⑧克林顿1993年11月7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的讲话。

⑨邓小平1989年12月10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斯夫特时的谈话。